

日治時期高雄勞工運動 歷史變遷之探討

撰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專任教授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長 李文環

摘要

本文以組織作為觀察視角，試圖脈絡化日治時期高雄勞工運動之形成與演變。研究發現，高雄勞工運動約可分為：自我組織、外部介入、自我組織與外部團體並進等三階段。整體而言，政治大環境亦即大正民主應該才是勞工運動萌芽的主要前提。有此政治條件才能讓日治以來臺灣人因教育和媒體所帶來的知識增長，因殖民地知識分子受到殖民母國近代化文化啟蒙與洗禮，最晚在 1910 年代萌生高雄的勞工運動。後隨 1920 年代臺灣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民族啟蒙和協力等種種文化力量，勞工團體漸行組織，並得以獲得社會運動的實踐，並不斷滾動修正。而其背後，隱含著島內臺人政治團體的分裂與競爭，政團為了擴大影響力無不積極涉入勞工團體與運動，而高雄的兩大勞工運動事件剛好分別在當時最重要的左翼和右翼政團組織協助下，發揮了最大的影響力。

關鍵詞：勞工運動、組織、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Kaohsiung Labor Movemen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en-Huan Lee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the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organization as an observation perspective try to contextualize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Kaohsiung labor movemen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Research Endings that the Kaohsiung labor movement can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elf-organization, 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 goes hand in hand with external groups. Overall,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is, Taisho democracy, should be the main prerequisite for the labor movement. Against this political background, the labor movement emerged in Kaohsiung in the 1910s at the latest,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from education and media since Japan took over Taiwan. Later, with the national enlightenment and assistance promoted by the Taiwan Cultural Association in the 1920s, labor groups gradually organized and were able to gain practice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inuously rolling correction. Behind the incident are the divisions and competition among Taiwanese political groups on the island. In order to expand their influence, political groups actively involved themselves in labor groups and movements. Also because of this, the two major labor movement events in Kaohsiung were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t the time.

Keywords: Labor Movement, Organization, Taiwan Cultural Association, Taiwan People's Party

- 壹、前言
- 貳、自我組織的勞工運動
- 參、文協啟蒙、新文協介入
- 肆、高雄工友會、臺灣鐵工所罷工事件與全島總罷工
- 伍、黃賜與臺灣民眾黨主導下的淺野水泥高雄工場大罷工
- 陸、結論

壹、前言

勞工運動或工人運動，泛指某個或某些勞工團體為了獲得較好的待遇而組織起來的抗爭活動。日治時期，高雄的勞工運動以 1927 年臺灣鐵工所和 1928 年淺野水泥高雄工場的罷工事件，最受學者關注。矢內原忠雄據此認為，臺灣的資本主義化已經到了一定的高度。¹ 然而依據高雄市役所的調查，在 1928 年高雄市職業別戶數中，工業從業人口數是最少的一群，² 為何相對少數的工業從業者反而引領風騷展開高雄的社會運動，頗令人玩味。

有關高雄產業或勞工運動之相關研究，前者頗多，例如蕭采芳的〈1930 年代後期的高雄港與軍需工業〉、吳連賞的《高雄都會區工業發展的時空過程和環境變遷》、吳濟華主持的《高雄市的產業：從農工、重化到高科技》、陳淑端的〈空間與地方文化燒製——高雄城市文化脈絡下的唐榮磚窯廠〉、王御風的《舊港新灣：打狗港濱戲獅甲》和〈高雄港、飛行場與工業區：從《鳳山地政》檔案看日治末期戲獅甲、草衙工業區的發展〉……，³ 成果為數不少；後者則相對有限。2000 年高市府勞工局委託財團法人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所撰寫的《高雄市勞工史：概論》，乃是筆者目前所知專書探討高雄勞

1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二版）（臺北：海峽學術，2002），頁 114。

2 高雄市役所，《高雄市勢要覽（昭和三年版）》（出版地不詳：高雄市役所，1929），頁 8。

3 蕭采芳，〈1930 年代後期的高雄港與軍需工業〉（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7）。吳連賞，《高雄都會區工業發展的時空過程和環境變遷》（高雄：高雄復文，1995）。吳濟華主持，《高雄市的產業：從農工、重化到高科技》（高雄：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2）。陳淑端，〈空間與地方文化燒製——高雄城市文化脈絡下的唐榮磚窯廠〉（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所碩士論文，2013）。王御風，《舊港新灣：打狗港濱戲獅甲》（高雄：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8），頁 33。王御風，〈高雄港、飛行場與工業區：從《鳳山地政》檔案看日治末期戲獅甲、草衙工業區的發展〉，《高雄文獻》，12（1）（2022），頁 19-20。

工最早的作品，不過有關日治時期的同盟罷工僅以要點性介紹。⁴有趣的是，這本報告書將高雄的勞工史向上溯及 19 世紀中葉打狗開港後受到國際資本影響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受此啟發，筆者以「罷工」和「罷業」檢索《臺灣日日新報》發現，第一筆相關報導始於 1897 年 4 月，可見勞工問題確實有其更為久遠的脈絡。不過，這樣的視野隱含「資本」必然導致勞工問題的二元對立的理論性盲點。

人與人相處必然有某種問題的存在，但是，有問題不必然會發生抗爭，有抗爭也不必然產生社會運動。個人認為，勞工問題、勞工抗爭、勞工運動，三者不必然劃上等號，三者如何形成系統性的關聯，其關鍵應該是組織。組織一詞，具有動詞和名詞兩種意涵，前者是職能、後者是集體，亦即組織是具有動能且具系統性的團體。以此概念，本文試圖探討高雄勞工運動的組織形成與演變。

有關高雄勞工運動的學術研究相對少數。脫胎於 2006 年的博士論文，王御風於 2013 年出版《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乙書應該是首部相關作品，他以「工運為主的抗爭時代（1927-1931）」為標題，從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的介入角度，脈絡性地討論這兩項重要勞運事件，尤為強調工運背後的組織運作，先是臺灣文化協會及臺灣民眾黨，後則是臺灣共產黨。⁵王御風所指出的面向，其實是勞工運動受到外在組織介入所產生的力量。事實上，目前並無專章探討日治時期高雄勞工運動的作品，大多數學者以全臺性範圍來探討這項臺灣社會的重要變遷。例如黃師樵的〈日據時期臺灣工人運動史〉、張明雄的〈日據時期臺灣勞工運動之發展〉、江亮演的〈日據時代台灣農民與勞工的社會運動〉。⁶以 1997 年江亮演的〈日據時代臺灣農民與勞工的社會運動〉為例，他認為勞農問題除了爭取自由或生存權利外，還有複雜的民族情結。⁷這樣的看法，某種程度受限於當時文獻侷限以及《警察沿革誌》⁸煽動史觀的影響。直至 2014 年間，蔣闊宇探討這項議題才有了新的視角。

4 財團法人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執行，《高雄市勞工史——概論》專題委託研究報告書（高雄：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委託，2000），頁 25-27。

5 王御風，《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臺北：玉山社，2013），頁 153-163。

6 黃師樵，〈日據時代臺灣工人運動史（1-4）〉，《夏潮》，2（5）至 3（2）。張明雄，〈日據時期臺灣勞工運動之發展〉，《勞工研究》，89（1987），頁 114-125。江亮演，〈日據時代台灣農民與勞工的社會運動〉，《社會科學學報》，5（1997），頁 1-14。

7 江亮演，〈日據時代台灣農民與勞工的社會運動〉，頁 1-14。

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共四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2011）。

蔣闊宇的碩論〈殖民地時期臺灣勞工抗爭史〉後來以《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出版，他以「工人階級的政治主體性」亦即以工人主體的能動性為視角，並且借用盧卡奇（Georg Lukacs）對於革命工人組織的理解，亦即組織作為不同個體意識的能動性之匯流，這股力量足以改變物質存在，推動歷史進程。⁹蔣闊宇所立基的「組織」是發自工人政治主體性的史觀，剛好可與王御風的外在組織介入，兩者互為辯證提供筆者一些思考。

在這些研究基礎上，本文試著脈絡化高雄勞工從沒有組織的罷工抗爭發展到具組織化勞工運動的演變歷程。

貳、自我組織的勞工運動

《臺灣日日新報》是日治時期在臺發行歷時性最完整的報紙，可作為觀察臺灣社會事件發展之梗概。以「罷工」檢索《臺灣日日新報》共計 546 則，報導期程自 1898 年 2 月起至 1937 年 5 月間；以「罷業」檢索《臺灣日日新報》共計 3,860 則，報導期程自 1897 年 4 月到 1944 年 3 月間。「罷工」報導似乎比較侷限於日本內地和臺灣島內，因此自 1937 年以後受到軍事動員影響，這類報導就沒了。「罷業」報導擴及國外罷工事件，因此直到 1944 年間仍持續不斷。初步瀏覽這些報導的標題，早期發生在臺灣的罷工人群至少有：學生、轎丁、製茶工、苦力、小作人、藝妓、水夫、輕便鐵道員工、糖廠員工……。可見臺灣勞工以集體罷工手段進行抗爭的事件，起源早、議題也多元。

從罷工事件的規模來看，臺灣勞工抗爭應該也是受到日本與世界潮流所影響。日本本土在 1912 年明治時代結束後，「大正民主運動」的時代開啟，挑戰長期壟斷的藩閥，普選運動活躍。同樣在 1910 年代，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民主主義昂揚，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於 1918 年提出民族自決（people's self-determination），許多殖民地開始要求獨立。在亞洲，也受日本統治的朝鮮於 1919 年

9 蔣闊宇，〈殖民地時期臺灣勞工抗爭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 7-12。蔣闊宇，〈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臺北：前衛，2020）。

爆發「三一事件」，為持續八個月的抗日獨立運動；中國則在同年發生了五四運動。¹⁰在此前後，世界各地的民族運動與民主思潮相互震盪，臺灣自然也受這波世界性思潮的影響。

有關打狗地區罷工的最早報導，乃是 1915 年 1 月 13 日坐落三塊厝的臺灣煉瓦會社打狗工場 50 名職工的罷工案，原因是要求提高工資。這事件後來在打狗支廳官方協調下解決。¹¹臺灣煉瓦打狗工場源起於日人鮫島盛在三塊厝郊區所創辦的「煉瓦工場」，這座新式磚窯廠可謂 20 世紀初高雄最早的工業。1915 年之後，磚窯廠罷工案未見後續報導，不過仍可略窺工業發展伴隨著勞工爭議的趨勢似乎難以迴避。而後幾年間，打狗地區勞工罷業事件轉向船員和船匠。

1918 年 3 月 12 日發生東海丸船員罷工案。載運鹽水港製糖的白糖的東海丸，12 日上午出港後不久，低階船員 60 餘名以「冒著生命危險遠航」為由，突然集體罷工要求額外報酬，高階船員勸說無效，資方不得已，最終承諾每人致贈 50 圓達成協定而平息。¹²這項以「冒著生命危險遠航」的說法，可能是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代背景而來。同年 1 月，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和平原則，對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的民主運動和民族主義造成重大影響。日本國內，勞工問題和社會運動接踵而來，農會、工會紛紛成立，社會主義運動益趨積極。臺灣／打狗的勞工問題，很難不受日本內地風潮的影響。

1919 年 7 月，打狗的造船工匠 40 餘名要求調高工資，16 日發動集體罷工，在支廳的介入調停下，至 19 日，勞資雙方期能各退讓一步。¹³未果。8 月，船大工也因為調薪問題未獲解決而依然罷工。對此，造船業者對勞方擺出強硬的態度。¹⁴同時間，駁船船夫也要求調漲工資，但駁船關係業者意向不明。¹⁵至 1920 年 1 月間，船大工罷業仍持續中。¹⁶同年 1 月 12 日，打狗洋服職工和臺南洋服職工為調漲薪資而聯合罷工，其實，這次事件

10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晚報，1989），頁 11。

11 〈工場同盟罷業〉，《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15 年 1 月 22 日），第 3 版。

12 〈船員罷工騒ぎ 包金で納まる〉，《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8 年 3 月 16 日），第 7 版。〈船員罷工解決〉，《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8 年 3 月 17 日），第 6 版。

13 〈船匠罷業同盟〉，《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9 年 7 月 19 日），第 6 版。〈船大工罷業 雙方の譲歩にて解決〉，《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9 年 7 月 20 日），第 7 版。

14 〈打狗的罷工 洋服職工と船大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0 年 1 月 14 日），第 7 版。

15 〈打狗舥船夫直上要求 食料其他五割増〉，《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9 年 8 月 17 日），第 7 版。

16 〈打狗罷業續報 硬軟二派を生ず〉，《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0 年 1 月 16 日），第 2 版。

背後應該是臺中、嘉義、臺南和阿猴等聯合所做出的聯合行動。打狗地區的店主們，以要求加薪 50% 過於不講理。¹⁷ 這些罷工事件後續發展雖缺乏報導而無法一一釐清，不過可略窺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打狗地區，勞工問題與抗爭事件相繼展開，規模也日益擴大。

1921 年 7 月 21 日，高雄臺灣鐵工會社有職工 300 餘名，其中，本島人 260、內地人 20 聯合進行罷工，原因是製糖機械的汽缸做不出來，正要重做的時候，會社從內地調來 8 名熟練職工，機械職工們有感於自己有被解僱的風險而罷工。¹⁸ 23 日，會社停止解僱甲斐伍長以下 5 名職工，才圓滿解決罷工事件。¹⁹ 可見當時高雄勞工已有能力進行自我組織，這種社會現象在日本更為普遍。

蔡石山指出，1920 年前後日本的工場勞工和農民組合的會員人數不斷增加。罷工、罷耕事件層出不窮，甚至紡織工場的女工以及在會社上班的女職員，也開始抱怨她們的工作環境欠佳，工資太低，因而做出反抗行為，諸如把頭髮剪短，經常上咖啡廳或舞廳，或者不再寄錢回鄉下老家。有抱負的青年人，上貴族學校或大學時，熱衷參加馬克思讀書會，有的甚至致力於提升群眾的政治意識。他認為這是日本整體知識環境的改變。²⁰ 所謂知識環境可從教育和媒體來略窺。

根據吳文星的研究，1910 年代社會領導階層中有 48% 受漢學教育，53% 受工學校、中學、師範、醫學或留學等新式教育。²¹ 即使傳統漢學在 1910 年代仍有一定影響力，隨著報紙引進與推廣，為臺灣人對於外界認識建立一些管道。早在 1906 年 7 月 1 日，《臺灣日日新報》就刊登一首由珮香所寫的古典詩作〈看報紙〉，他說：

一張薄紙盡人情 報我何須聽以聲 閉戶曠觀天下小 果然世界屬文明
縱橫萬國富包羅 文物星陳怪異多 紙面人情但如此 不妨走馬看花過²²

報紙多樣性內容，也讓沉浸傳統詩作的知識分子有了新的視野。黃美娥也指出，發行於 1905 至 1911 年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在該報的小說欄上，曾經刊登了若干以

17 〈打狗の罷工 洋服職工と船大工〉，第 7 版。

18 〈高雄鐵工所職工百八十名の罷業 位置の保障を要求して〉，《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 年 7 月 27 日），第 3 版。

19 〈高雄鐵工所同盟罷業 圓滿に解決す〉，《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 年 7 月 24 日），第 7 版。

20 蔡石山，《滄桑十年 簡吉與臺灣農民運動（1924-1934）》（臺北：遠流，2012），頁 12-25。

21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頁 152。

22 〈看報紙〉，《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6 年 7 月 1 日），第 1 版。

西洋國家人、事、物為創作背景的通俗小說，由於「小說」在本質上具有地理學的特質，所以這些小說可以被解讀為展示臺人西洋地理知識與想像技術的極佳文本。這些小說反映了明治時期臺灣的「西洋」認識論，也同時顯露出 20 世紀初期臺人對於理解、想像西方現代性的思維高度。²³ 換言之，臺灣的知識環境隨著基礎教育和報章雜誌的推展，訊息獲得已經明顯改善，這是普羅大眾得以自覺並爭取自我權益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政治團體的活動空間才能推展開來。

參、文協啟蒙、新文協介入

1921 年 10 月 17 日，臺灣文化協會在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舉行創立大會。以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全臺五州各有理事和議員數人。至 1923 年間會員共有 652 名，其中臺北州 166 名、新竹州 28 名、臺中州 231 名、臺南州 77 名、高雄州 53 名、海外 97 名。²⁴ 在此前後，文化協會的核心人物無不致力於媒體經營。《臺灣青年》於 1920 年 7 月創刊，主要由林呈祿、蔡培火與彭華英三人負責創刊，蔡培火擔任編輯兼發行人。1922 年 4 月改為《臺灣》。1923 年 6 月《臺灣》雜誌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型態，本社設於東京，支局就設在文化協會創辦人蔣渭水於臺北市太平町的處所。《臺灣青年》和《臺灣》雜誌均為漢文、日文參半，發行數量最高不過 3,000 部。1923 年 4 月為了擴展讀者群，決定以白話漢字出刊《臺灣民報》，甚至該報總批發處設於蔣渭水的大安醫院北隅，與文化協會合署。²⁵ 媒體報刊與文化團體進一步緊密結合。

文化協會以《臺灣民報》作為協會宣傳工具，在臺北、新竹、臺中、員林、臺南等地設立十餘處讀報社，四處舉辦演講，並且成立文化書局、文化劇團，也舉辦各種有關歷史、法律、衛生等短期或長期的講習會，進行文化演講會、文化劇運動。其中，講習會近似課堂教育，文化演講會（簡稱：文講）具大眾開放性，此一開放性使得文化演講會具有文化運動的性質。賴莞頻研究指出，1925 年是文講的高峰期，該年全島五州平均

23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5（2009），頁 1-39。

24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1988），頁 55-56、63。

25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臺北：遠流，2008），頁 90-91。

聽眾為 374 人；高雄州方面，自 1923 年起文化協會在高雄舉辦文講從是年的 1 次 200 人，至 1926 年間有 35 場，9,190 人。²⁶

文化協會以報刊引介知識，再透過文講以及支持眾所皆知的設置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前者是文化啟蒙，後者是以自治主義運動方式，臺灣菁英複製、挪用殖民者的論述、遵循殖民者遊戲規則，展現高度自主性，追求臺灣人權利向日本當局抗爭，具有抵抗殖民統治特性並勾勒出以臺灣作為共同體空間的我族想像。誠如蔡培火所說：「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亦為我等臺灣人之臺灣。」但接受日本帝國統治現狀，隱含妥協性格。²⁷而且，被殖民者一旦默許了殖民者的意識形態，無異是接受了自己在權力關係中被分派的角色。這種情形，文化協會隨著留學日本、中國的學生大量增加，這些留學生在海外接受當時世界社會主義思想潮流並帶回臺灣，對文化協會產生了很大影響，使文協在民族主義之外，又添增了社會主義的色彩，因而導致文化協會的分裂。

1927 年 1 月 2 日文化協會臨時大會之前的理事會在臺中東華名產株式會社事務所舉行，出席者 37 名，左右兩派人馬正式對決，會中最後就蔡培火和連溫卿所提修正綱領正式投票，由連溫卿提案勝出，左派取得優勢。隔日，臨時大會在臺中公會堂舉行，到會會員 190 名，進行臨時中央委員改選，左派人馬勝出，連溫卿、王敏川成為新的領導人。²⁸蔣渭水此時思想已左傾，但因為與連溫卿仍有一些意見上的分歧，遂與右派人馬一起退出文協，另組臺灣民眾黨。這是文協的第一次分裂，左派的連溫卿開始主導文協。

早在 1923 年間，連溫卿透過日本左翼分子山口小靜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均、山川菊夫婦交往，隔年前往東京參加世界語大會時就住在山川家，深受山川均主義亦即勞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²⁹新文協是以連溫卿提案宗旨「促進大眾文化之實現」為基礎，在蔣渭水提請討論後訂出十項綱領，包括：「第一提升農村文化，第二增加商業知識，第三涵養自治精神，第四獎勵青年求學，第五提倡女權運動，第六改良婚姻制度，第七廢止阿片吸食，第八打破迷信惡習，第九普及衛生思想，第十獎勵恪守時間。」³⁰很明顯，新文

26 賴莞頻，〈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民報》共塑公共領域：以文化講演會為中心一九二三～一九二六〉，《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0（2）（2012），頁 77。

27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頁 38、66。

28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頁 161-162。

29 伊藤幹彦，〈台灣社會主義思想之研究：連溫卿與謝雪紅〉，《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42（2）（2004），頁 48。

30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頁 160-161。

協比舊文協更傾向積極動員民眾。連溫卿還是文化協會的理事時，在文協中是屬於左傾社會主義思想分子，主張階級鬥爭，當他成為新文協領導人之後更積極介入政治社會運動。

以「工友會」檢索《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間，以職工、教師和學生組成的「臺北第二工業學校工友會」是第一個被報導的勞工組織。後來比較具影響力的工會是 1925 年 6 月 1 日成立的洋服工友會，在臺北江山樓舉行發會式，會長林金森、會員有百餘名。

³¹ 這是在臺北市各洋服店店員為聯絡聲氣所組織而成。1926 年 11 月 19 日，臺北機械工友會成立，其宗旨是：「我們機械工因為要維持生活之向上及啟發知識，組織機械工會以互相勉勵、互相扶助，期望將來成為完全之勞動者，可得有意義之生活。」隔年 1 月，基隆機械工會成立，未及一個月，隨即聯合統一組織「臺灣機械工聯合會」，由連溫卿擔任顧問。³²

1927 年 2 月 7 日，洋服工友會因不滿店東所給工資，聯合發動罷工，後來導致 20 餘名會員被解僱。店東林茂泰號乃自基隆方面僱用裁縫師，引發該會不滿，至店裡告知該裁縫師，引起店東不滿。洋服工友會鑒於這些糾紛與被解僱者之生計，遂議自行設置一營業部，由工會經營。15 日午後 2 點，在中華會館開會，承諾加入資金者達百餘名。³³ 工會不僅帶領會員發動集體罷工，若資方不肯妥協救濟無門時，甚至以工會發動募款籌組自行營運的自力救濟。可見當時的工會組織運作已有一定的成熟度，也因如此，集體罷工的規模日益擴大。1927 年 2 月 17 日，製鞋工鑒於所得「入不敷出」，自新年以來與店東商討調高工資，最終不果引發衝突，60 餘名會友中有 40 餘名被解僱，自 7 日起集體罷工。³⁴ 這些發生在北部的工會組織和勞工運動，隨即被複製到高雄來。

1927 年 4 月 3 日，高雄臺灣機械工友會（簡稱：高雄工友會）在高雄樓舉行發會式，會長王風，書記郭盛，外交員（公關）鎮海龍。王風是高雄臺灣鐵工所員工，郭盛是專賣局員工。³⁵ 是日，來賓有臺北工友會代表陳金火、楊添杏、王江崑，臺南工友會長楊頓等二人。此外，還有市役所代表龜介保太郎、《臺南新報》高橋賴一、中華會長周炳章、

31 〈洋服工友會會況〉，《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5 年 6 月 3 日），漢文第 4 版。

32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頁 166。

33 〈華僑工友罷工詳報 製鞋工友會員解雇四十餘名〉，《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7 年 2 月 17 日），漢文第 4 版。

34 同上註。

35 「雇郭盛依願免ノ件」（1926 年 7 月 1 日），〈大正十五年七月至九月人事書類專賣局〉，《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124480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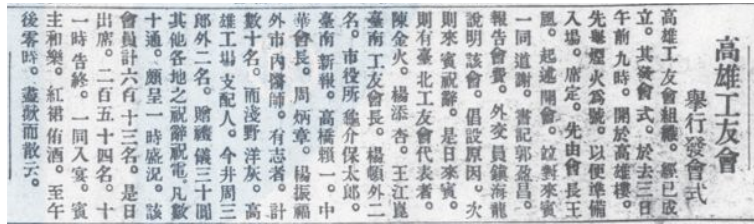


圖 1 高雄工友會舉行發會式報導

圖片來源：〈高雄工友會舉行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7年4月5日），漢文第6版。



圖 2 高雄機械工友會員發命式紀念（1927年4月3日）

圖片來源：〈高雄臺灣機械工友會員發命式紀念〉，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3.013.023。

楊振福醫師等，淺野洋灰高雄工場支配人（經理）今井周三郎等二人致贈禮金 30 圓。³⁶ 依據宮川次郎的說法，高雄工友會乃是出自住在高雄的文化協會會員郭盛的計畫，他聯絡領袖連溫卿和臺南機械工業會會長郭墩等，以高雄鐵工所職工為主，糾合其他各會社工場本島人職工七百名而來。後來推王風為會長。³⁷ 可見，高雄工友會即為前述臺灣機

³⁶ 〈高雄工友會舉行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7年4月5日），漢文第6版。

³⁷ 宮川次郎，《臺灣的農民運動》（臺北：拓殖通信社支社，1927），頁 67。

械工聯合會在高雄所成立的分支組織，很明顯都是受到新文協和連溫卿的介入與影響。

肆、高雄工友會、臺灣鐵工所罷工事件與全島總罷工

高雄工友會草創之初就有會員 613 名，³⁸ 其中，臺灣鐵工所有 100 多名，淺野洋灰會社有 300 多名，鐵道部工場及其他小型鐵工所則有 200 餘名。³⁹ 因為籌備聲勢頗大，4 月 3 日發會式當天即受到警方嚴密監控，實際到場出席者僅 254 名。⁴⁰ 三天後就爆發臺灣鐵工所本島人職工百十餘名的集體罷工事件。

臺灣鐵工所是整合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鑄物工場（簡稱：鑄物工場）和鈴木製鋼所而成。⁴¹ 1927 年 4 月 4 日，臺灣鐵工所以王風為不良職工，命令其退職。⁴² 當天晚上，高雄工友會集合 300 多名會員商討對策，要求資方立刻讓王風復職。4 月 5 日，鐵工所職工們開始怠業，同時派代表拜會廠長。然而資方完全拒絕工人的要求，首次談判不歡而散。高雄工友會遂決議隔日實行員工總辭職，同時傳書向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等友誼團體請求支援。4 月 7 日，臺灣鐵工所總數 160 餘名臺灣人職工中，有 120 餘名加入罷工。⁴³

4 月 8 日，高雄工友會書記郭盛與鐵工所庶務主任松田進行商談，郭盛提出四個條件：（1）被解職職工王風應復職、（2）應給付解職期間的日俸、（3）會社不可藉此解僱工友會幹部、（4）應承認工友會的存在。然而，會社對此表明，第一項毫無商討餘地，其他項可考慮。⁴⁴ 資方展現強勢態度，16 日會社甚至發表聲明書，宣布將罷工者 113 名予以解職，同時將支付積立金（儲備金）、宿舍料（宿舍補貼）加以沒收；同日晚上 8 點，大約 300 名職工在鹽埕町事務所會合共商對策，市尹岩本、淺野水泥支店長

38 〈高雄工友會舉行發會式〉，漢文第 6 版。

39 蔣閣宇，〈《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頁 77-78。

40 〈高雄工友會舉行發會式〉，漢文第 6 版。

41 田中一二、芝中一，〈《臺灣の工業地 打狗港》（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8）〉，頁 14-15。

42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頁 167。

43 蔣閣宇，〈《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頁 78。

44 〈臺灣鐵工會社の同盟罷業は 持久戦に入る〉，〈《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7 年 4 月 10 日）〉，第 5 版。

今井等也一同和會社交涉，過了晚上 11 點才散會。⁴⁵17 日早上，六七十名被解僱員工簇擁至會社欲領取相關費用，會社卻以「向來職工有如此（罷工）作為，被解雇之時，積立金有不返還之規定」回覆，因此並無一人領到相關費用。⁴⁶至此，勞資破裂，進入雙方對峙的狀態。

臺灣鐵工所罷工事件首先獲得臺灣機械工會的支持。4 月 11 日，臺灣機械工會發表支持宣言說：

工人為了擁護自己利益而以合法手段籌謀團結，此為至公至理之事……
親愛的高雄工友會既決議同盟罷工，故下令將全部的工友開往前防作戰……
為了對付以工人生產品為生涯的工業資本家之橫暴，現在我輩臺北機械工會
所應取之態度如次：

決議文

1. 爭議中誓不為高雄鐵工所主之雇傭。
2. 爭取其他任何有利之援助。⁴⁷

這項宣言獲得全臺灣勞工團體和思想團體的關注。連溫卿更倡議進行全島總罷工。依據他自己的說法，參與全島總罷工工場數計有 30 處，臺北有 17 工場、臺南有 11 工場、高雄有 2 工場（淺野水泥和武智農具）。⁴⁸例如：4 月 21 日晚上 7 點，臺灣機械工聯合會、臺北機械工會、臺北木工工友會、臺北工友協助會、臺灣工人同風會、臺灣塗工會、臺灣青年讀書會和文化協會等，為了表達對高雄罷工團體之同情與支持，在臺北市港町舉辦文化講座，聆聽者六七百名。此行為引來警方注意，後來被命令解散。⁴⁹雖然如此，22 日各團體在基隆、臺北、桃園、新竹、苑裡、通宵、苗栗、豐原、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等處實行全臺灣之同情罷工，參與罷工工場不論官業和民營共 60 餘家，人數約 4,000 餘人，結果在警察施壓下，被檢束者計有 130 餘名，最終不得不告失敗。⁵⁰

45 〈罷業する以上 解雇は覺悟の前 職工の身の振り方は 左まで困難ではない 工友會の幹部談〉，《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7 年 4 月 18 日），第 2 版。

46 〈臺灣鐵工會社事件 解雇職工 交渉徴収之運動會費及解職手當金〉，《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7 年 4 月 19 日），漢文第 4 版。

47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頁 170-171。

48 同上註，頁 169。

49 〈同情高雄之罷工 開講演會〉，《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7 年 4 月 23 日），漢文第 4 版。

50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頁 168。

這項行動可謂臺灣史上首次的全島性總罷工。

1927 年五一勞動節之後，高雄警察署決定出面仲裁，警方對外遮斷高雄機械工會與臺灣社會運動網絡的聯繫，瓦解工運和農民運動、文化協會的連帶，使之孤立無援。對內則是以「自由」與「正義」為名，破壞工人的團結，一旦工人間的集體約束力消失，就能為會員中的機會主義者創造縫隙，讓他們將情勢轉向資方。5 月底，警方採取更大動作，開始逮捕工會幹部與罷工者，25 日，蘇、郭、黃三人被押送至法院候審。而面對資方與警方的雙重打擊，罷工團體陷入危機。高雄工友會做了戰略和組織上的調整，最重要的組織調整，即工人們推舉原臺南機械工友會的工人幹部黃賜擔任顧問，⁵¹ 不久後更名為高雄機械工友會。這是高雄勞工組織從左翼轉向右翼的關鍵。

左翼工會之所以弱化或轉向，蔣閼宇認為有三項因素：一是左翼工會主力——臺灣機械工會系統逐漸分化而失去主導權；二是原本試圖建立「臺灣總工會」的計畫一直沒有成功，以致無法整合原有產業別、職業別的工會；三是 1927 年 11 月發生新竹市事件，文化協會多名左翼幹部遭到逮捕等。⁵² 這些因素使得蔣渭水主導的臺灣民眾黨有了成立全島性勞工組織的機會。



伍、黃賜與臺灣民眾黨主導下的淺野水泥高雄工場大罷工

1927 年 1 月連溫卿、王敏川等左傾社會主義者取得新文協主導權後，同年 2 月間，以蔣渭水為首的舊幹部籌組「臺灣自治會」，適逢發生無政府主義黑色青年聯盟事件，⁵³ 臺灣總督府採取全島大逮捕，又以「臺灣自治」嚴重違背日本「治臺」之根本精神予以禁止。蔣渭水並不因此氣餒，2 月 27 日又以「臺灣同盟會」之名義，籌設「自治會」。⁵⁴

51 蔣閼宇，《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頁 116。

52 同上註，頁 149-151。

53 臺灣黑色青年聯盟是成立於 1926 年的臺灣左派組織，發起人小澤一深受成立於東京的黑色青年聯盟的影響，是臺灣日治時期少見以無政府主義為方針與信仰的左派組織。1927 年 2 月 1 日，臺灣黑色青年聯盟主要成員 44 人被當局逮捕。

54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臺北：稻鄉，1991），頁 59-60。

3 月再度被禁止。「自治會」或「同盟會」皆不脫民族色彩。

不過，歷經 4 月的臺灣鐵工所勞工運動之後，蔣渭水等舊幹部認為文化啟蒙運動已經告一段落，應該進展至以民眾為主力的政治運動層次。⁵⁵ 簡炯仁認為，蔣渭水從文化協會分裂至臺灣民眾黨成立前，其思想進入「發展期」，這個階段蔣渭水主張「以農工階段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和「農工商學共同載線」，社會運動已是蔣渭水的政治選項。

1927 年 5 月 8 日，約 46 名文協舊幹部在臺中東華名產會社召開政治磋商會，後由葉榮鐘提議以「臺政革新會」為名籌組「臺灣民眾黨」，6 月 3 日被禁治。⁵⁶ 後來，舊幹部們終於體認到現階段臺灣的民族運動有重新組織結社之必要，於是更名改設「臺灣民眾黨」，並將綱領改訂為：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再度向官方交涉，⁵⁷ 最終於 7 月 10 日臺灣民眾黨在臺中市聚英樓召開成立大會，黨員 165 人。同年 11 月 26 日，民眾黨陸續成立大甲、汐止、新竹、桃園、嘉義、臺北、宜蘭、臺中、彰化、基隆、清水、高雄、北港等共 15 個支部。⁵⁸ 蔣渭水是臺灣民眾黨的領袖，因此「以農工階段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和「農工商學共同載線」也就成為立黨精神及其指導原則。⁵⁹ 在黨綱上，對內工作「基礎工作」是從農民、工人、商民、學界、青年、婦女等面向「組織民眾」來「喚起民眾」。⁶⁰ 黃賜後來成為高雄支部的主幹（地區主要負責人），高雄地區的勞工運動與政黨正式連結起來。

一、黃賜與臺灣民眾黨的勞團介入

黃賜（1892-1947）出生於臺南市永樂町，黃澤霖之長子。1916 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的「仕上科」（裝修科）。⁶¹ 戶籍資料記載，1922 年 9 月黃賜從本居地（臺

55 蔣朝根編著，《臺灣民眾黨特刊 第一冊（復刻及附冊）》（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2020），頁 12-13。

56 同上註，頁 9。

57 簡炯仁，《臺灣民眾黨》，頁 68-69。

58 蔣朝根編著，《臺灣民眾黨特刊 第一冊（復刻及附冊）》，頁 12-13。

59 簡炯仁，《臺灣民眾黨》，頁 86。

60 蔣朝根編著，《臺灣民眾黨特刊 第一冊（復刻及附冊）》，折頁。

61 臺灣總督府，《府報》（1916 年 7 月 13 日），頁 37。



南市永樂町)寄留鳳山郡小港庄,職業欄記有「會社」,應該是任職於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後壁林製糖所,1925 年退去小港庄戶籍返回臺南,1927 年間參與臺南機械工友會,臺灣鐵工所罷工運動中,黃賜和盧丙丁募款 200 餘圓給高雄工友會作為罷工基金。⁶²5 月,黃賜應邀擔任顧問。

誠如前述,臺灣鐵工所罷工的尾端,高雄工友會做了戰略上的調整,不僅由鐵工所罷工團 8 名工人委員成立行商團,更籌組勞工自主企業,後者即由黃賜想辦法推動「工友鐵工所」籌建計畫。⁶³1927 年 6 月 4 日,黃賜與 30 名鐵工所職工討論,初步構想運用全島總罷工各社會所捐約 1,000 多圓,打算建立工人自己的事業體「株式會社明德工程局」,但最後決定以株式會社方式,每位會員各持有一股(20 圓),場址設於三塊厝,然而興建期間遭遇颱風而使得計畫中斷。⁶⁴

1927 年 7 月蔣渭水所領導的臺灣民眾黨成立之後,同年 10 月 24 日成立高雄支部,⁶⁵初由黃賜擔任高雄支部主要負責人,後由楊金虎擔任。11 月,黃賜當選該黨中央執行委員,與楊金虎、李炳森、陳江力同為高雄地區的委員。⁶⁶而楊金虎、李炳森皆為當時高雄市官派協議員,可見臺灣民眾黨與當時高雄市臺籍地方菁英關係密切。也因為黃賜,高雄臺灣機械工友會更名為高雄機械工友會,外部協力組織從新文協轉為臺灣民眾黨。

黃賜將高雄機械工友會擬設工友工場情事告知蔣渭水,蔣渭水為其募款,雖僅募得 1,200 圓,不盡如意,後因淺野水泥株式會社整頓員工時發放許多離職金,其中多為高雄工友會成員,黃賜勸其投資,於是共獲得 2,240 圓,以此買下堀江町的「御影工作所」並成立「高雄工友鐵工場」。⁶⁷1927 年 12 月間,高雄工友會再從某會社被裁員的 60 餘名職工中,每口募得 20 圓,共獲得 5,000 多圓。⁶⁸新工場於 1928 年正式開業。依據 1929 年《高雄州商工人名錄》的記載,黃賜所成立的鐵工所坐落在三塊厝,年納營

62 〈高雄鐵工罷工的情況〉,《臺灣民報》(1927 年 4 月 9 日),第 155 號。

63 蔣閣宇,《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頁 116。

64 王御風,《從淺野到臺泥——臺灣第一的水泥廠》(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9),頁 165。

65 〈民眾黨高雄支部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7 年 10 月 25 日),第 5 版。

66 蔣朝根編著,《臺灣民眾黨特刊 第一冊(復刻及附冊)》,頁 12-13。

67 王御風,《從淺野到臺泥——臺灣第一的水泥廠》,頁 165。

68 〈高雄工友會組織鐵工場 預定不日興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7 年 12 月 12 日),漢文第 4 版。



圖3 臺灣民眾黨高雄支部結黨式紀念，照片中有蔡培火（第一排右5）、謝春木（謝南光）（第一排右6）、楊金虎（第三排右6）、黃賜（第四排右2）等人

圖片來源：〈臺灣民眾黨高雄支部結黨式紀念〉，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3.013.029。

業稅額 42 圓，與胡知頭鐵工所同為當年 10 所鐵工所之中規模最小者。⁶⁹ 這家由工人籌資興建的公司，營運由工人自治自理，實施 8 小時工作日，廠內更開設商店，為工人提供低於市價的日用品。⁷⁰ 依據黃賜長子黃獻瑞、長媳黃陳白玉和孫子黃吉志的口述，黃賜的事業主要經商，規模頗大。黃獻瑞說，有工友鐵工場、水泥瓦會社、木材行。⁷¹ 黃陳白玉說，高雄工友鐵工場是第一家生產製造手拉式鐵門的鐵工場。巧合的是，1927 年 7 月 21 日，黃賜的戶籍也從臺南遷入三塊厝 65 番地，職業記為「鍛冶職」，往後幾年，黃賜的戶籍寄留地都在三塊厝一帶，至 1940 年才搬遷至內惟。礙於文獻匱乏，我們無法進一步了解這家由工人興建經營的鐵工場詳情，也不清楚黃賜參與其中的過程。不過，從黃賜戶籍搬遷過程，以及他運籌興建「株式會社明德工程局」和「高雄工友鐵工場」的角色來推測，高雄機械工友會、高雄工友鐵工場和臺灣民眾黨之間的關係密切，甚至

69 杉浦和作，《高雄州商工人名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編纂部，1929），頁 17。

70 蔣闢宇，〈殖民地時期臺灣勞工抗爭史〉，頁 68。

71 許雪姬訪問、丘慧君紀錄，〈黃獻瑞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記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246。



圖 4 高雄機械工友會員會議，第三排右一者為黃賜

圖片來源：〈高雄機械工友會員會議〉，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3.013.027。

可說，黃賜所主導的高雄機械工友會，自 1927 年底以後已經成為臺灣民眾黨的協力團體。有趣的是，高雄機械工友會以自組生產工場的方式，試圖達成組織的自我運作，這是與前述新文協所支持下的高雄工友會所不同的地方。

1928 年 2 月 2 日，臺灣民眾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創設臺灣工友總聯盟。19 日，臺灣工友總聯盟正式成立，加盟團體共 34 個，會員有 6,367 人。⁷² 工友總聯盟規約第四條明文規定：

1. 援助工人及店員組織團體並促其發達。
2. 圖謀全島工人運動之統一。
3. 指導全島各團體的行動。
4. 整理各團體的組織系統。
5. 保持各團體的密切聯絡。
6. 調停各團體間的糾紛。
7. 促進各團體間切實的互助。

72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頁 152-153。蔣闊宇，〈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表 2。

8. 保證工人及店員的利益，解決其生活問題，並推行職業介紹的設施。⁷³

高雄地區加盟者計有：高雄市三塊厝工友工場、南部高雄印刷從業員會、高雄機械工友會、高雄土水工友會等。⁷⁴總之，在蔣渭水的積極鼓吹和臺灣民眾黨的號召下，這些工會聯合成就了臺灣第一個全島性工聯——臺灣工友總聯盟。⁷⁵黃賜在工友總聯盟中擔任教育部主任，⁷⁶十分活躍。淺野水泥同盟工事件即為黃賜所主導的重要社會運動。

二、淺野水泥高雄工場大罷工

淺野水泥株式會社高雄工場（簡稱：淺野水泥高雄工場）於1917年創設，後歷經三次擴廠，年生產量從1萬噸增加至22.9萬噸（1944年），始終獨占臺灣水泥市場。其水泥不僅滿足臺灣內需，更外銷南中國、南洋，至1937年日中戰爭爆發後，海外輸出幾陷於中斷。戰爭使得水泥兼具經濟與國防的雙重地位，此後至終戰，日本／臺灣的水泥業力求自給自足。整體而言，1917-1937年是淺野水泥高雄工場生產擴張的安定階段，但這時卻爆發大罷工。

1927年10月10日，淺野水泥高雄工場發生一起職災。吳禮、黃不痴兩名工人在壽山採集石灰石時意外引起石山崩塌。黃不痴下半身遭土石埋沒，吳禮遭土石滅頂身亡。在場所有工人各自捐出當日薪水的七成弔慰吳禮家屬，然而會社卻只出30圓當作吳禮家屬的慰問費，該金額大約是場內本島人工人一個月薪水，但不到日本職工半個月工資。資方拒絕支付喪葬費用，反而勸員工自行捐款給吳禮家屬治喪。淺野會社對於這項職災事件的處理方式激起眾怒。在黃賜主導下，高雄機械工友會於1927年11月13日向淺野水泥高雄工場提出正式訴求，希望能確立工作規則，條件比照日本內地的「工場法」、「職業就業規則」、「職工扶助法」。⁷⁷資方並無回應。

1927年12月20日，淺野水泥高雄工場機械係本島人職工吳石定因傷害罪被臺南地

7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頁1247-1247。

74 蔣朝根編著，《臺灣民眾黨特刊 第一冊（復刻及附冊）》，頁15。

75 蔣闓宇，《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頁131-133，表2。

76 〈工友總聯盟 中央執行委員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8年4月24日），漢文第4版。

77 蔣闓宇，《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頁182-183。

方裁判所拘留，會社以沒有正式請假、連續曠職為由，於 1928 年 2 月 14 日正式加以解僱。3 月 6 日出獄後，他向會社提出「因特別事件而被解僱或退職者限六個月以內」可申請特別通融給予復職。⁷⁸ 因此，吳石定向會社提出「缺勤屆」與廠方交涉，但廠方要求吳石定提出缺勤事件始末書並蓋印，吳石定或許不願罪行曝光，堅決不應。⁷⁹ 工會代表黃賜認為，場方不應該要求蓋印而進行交涉。然而，會社卻做出停止吳石定出勤的決定。⁸⁰ 吳石定所訴求的「特別事件」原委的解釋權顯然完全被資方所主導。資方在當時握有僱傭、薪資和福利等種種的絕對權力。

繼「工作規則」和吳石定解僱之後，3 月 13 日，黃賜代表高雄工友會再度向淺野水泥高雄工場表達本島人職工的四項訴求：

1. 準備出勤紀錄簿，厲行上班時間。
2. 出租職工宿舍給本島人。
3. 決定最低工資。
4. 提高加班津貼。⁸¹



圖 5 高雄機械工友會淺野水泥工場要求就業規則發表代表委員合影（1927 年 11 月 13 日），中間者為黃賜

圖片來源：〈高雄機械工友會淺野水泥工場要求就業規則發表代表委員成功紀念〉，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3.013.019。

78 宮川次郎，〈臺灣の社會運動〉（臺北：臺灣實業界社營業所，1929），頁 289-290。

79 蔣闓宇，〈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頁 184。

80 宮川次郎，〈臺灣の社會運動〉，頁 290。

81 翁佳音譯註，〈臺灣社會運動史——勞工運動、右派運動〉（臺北：稻鄉，1992），頁 93。

這四項訴求針對資方的僱傭條件、勤務規定、待遇等被當成內部規定而不做明文規定而來。淺野資方依然不作回應。

3月27日，機械係40名職工為了吳石定復職問題闖入工場內本島人職工事務所進行交涉。4月6日，本島人職工126人不聽場方制止，再度闖入，進行第三次交涉。最後會社斷然解僱41名職工。⁸²至此，解僱事件擴大，職工與會社形成對立。自4月14日起，淺野水泥高雄工場開始罷工，全部陷入停產狀態。⁸³

黃賜將此事件原委上報臺灣民眾黨之後，蔣渭水、謝春木、盧丙丁等民眾黨重要幹部立即南下坐鎮指揮，並成立「淺野水泥罷業職工總指揮部」，後續擴大規模打算長期抗爭。至5月初，罷工團人數高達700多人。

由於此時恰有日本皇族預定到高雄訪問，日籍人士唯恐爭議擴大，於是請中村一造出面調停雙方，但是資方堅持罷工工人退出工友會並對會社謝罪，此舉無法讓工友會同意。罷工團的動作更為加大，也被納入臺灣民眾黨的支持團體「工友總聯盟」直轄管理，並且設置「臺灣工友總聯盟淺野爭議本部」。⁸⁴依據「臺灣工友總聯盟淺野爭議本部」第九號戰報，總指揮為蔣渭水、謝春木、王受祝，分設：內務部、財政部、爭議部、糾察部、宣傳部、調查部、救濟部、職業紹介部、宣傳隊、調查隊等。黃賜和盧丙丁負責爭議部，主要負責與資方溝通協調。後來機動性調整，黃賜成為罷工團的總指揮。

但是，從4月26日到5月6日，陸續有罷業職工返回工場開始工作，臺灣民眾黨幹部為了防止罷工失敗，在田町、內惟（今鼓山區）設置20個臨時工友出張所，強勢監視罷業職工。⁸⁵如此使得出勤職工再度減少，5月7日再度停止作業。不過，資方在官方的默許下更為強硬。5月10日，淺野水泥採取強硬措施，解僱178名職工。⁸⁶警方則逕行介入。

5月6日罷工團成員莊帝騎腳踏車與人相撞，演變成互相毆打，警方隨後逮捕莊帝等6名工人。5月13日下午，大批警力突擊搜查罷工團本部及四周，總指揮黃賜、爭議

82 宮川次郎，《臺灣の社會運動》，頁290-291。

83 廖師慧，〈日治時期水泥工業之發展——以淺野財閥為中心〉（高雄：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碩士論文，2004），頁91。

84 王御風，《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頁158。

85 翁佳音譯註，《臺灣社會運動史——勞工運動、右派運動》，頁94-95。

86 廖師慧，〈日治時期水泥工業之發展——以淺野財閥為中心〉，頁91。

部部長梁加升被檢束，名義是「暴行威脅犯」。5 月 19 日，臺灣工友總聯盟再度召開臨時中央會議，並且派遣顧問蔣渭水南下高雄同警方交涉，雖警方再三強調客觀中立，往後卻又以違反暴力行為取締法之名義，陸續檢舉四五十名罷工團成員。其中，黃賜、梁加升、黃不痴等 37 人，更遭警方故意拖延法律程序，拒不移送地方法院，拘留在派出所內長達七個月之久。⁸⁷罷工於 1928 年 5 月終告失敗。

在此之後，全臺社會運動也在臺灣共產黨登場後走向激進化，以致 1929 年 2 月 12 日日本政府以不能公然宣傳共產主義逕稱違反「出版法」，導致臺灣農民組合包括簡吉在內等共 13 名幹部遭逮捕，這也就是所謂的「二·一二事件」。⁸⁸二·一二事件中，農民組合被逮捕者有 59 名，51 名最後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為由移送檢方，如：簡吉、楊春松、張行等人，簡吉被判刑監禁四個月（後改判一年）。此事件主要針對臺共進行彈壓，因而引起農民組合中的臺共黨員的反彈，⁸⁹臺共走入地下化組織，思想行動更為左傾。日警對於左翼活動的注意偵查不斷升高，同時也波及其他政治團體。之後，高雄不再出現具規模的勞工運動。就此而言，1928 年的淺野水泥高雄工場大罷工可謂日治時期高雄勞工運動的高峰與總結。



陸、結論

臺灣勞工以集體罷工手段進行抗爭的事件，起源早、議題也多元。依據《臺灣日日新報》所載，早期發生在臺灣的罷工人群至少有：學生、轎丁、製茶工、苦力、小作人、藝妓、水夫、輕便鐵道員工、糖廠員工……。不過，有關高雄勞工運動最早的報導，首見於 1915 年 1 月臺灣煉瓦會社打狗工場的職工罷工事件，後續至 1927 年 4 月 3 日高雄臺灣機械工友會成立之前，相繼出現船員、船匠和鐵工場職工等罷工。可見，在 1920 年代中葉之前，高雄勞工受到大時代文化啟蒙，已有能力進行自我組織，並發動罷工以爭取權益。

87 蔣闊宇，〈《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頁 192-193。

88 伊藤幹彥，〈台灣社會主義思想之研究：連溫卿與謝雪紅〉，頁 62-63。

89 楊渡，〈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臺北：南方家園文化，2009），頁 165-166。

1921 年文化協會成立，其所開啟的文化啟蒙與大正民主互為輝映。1927 年初文化協會分裂之後，左傾的連溫卿主導新文協走向社會運動路線，以臺北機械工友會為首，北部工會組織和勞工運動相繼展開，隨即被引介到高雄來。是年 4 月 3 日，在高雄的文化協會會員郭盛的計劃下成立高雄臺灣機械工友會，草創之初會員達 613 人，三天後所爆發臺灣鐵工所集體罷工事件，隨即受到臺灣機械工會的支持，更在連溫卿更倡議進行擴大成為臺灣史上首次的全島總罷工。很明顯，高雄臺灣機械工友會的成立以及臺灣鐵工所罷工事件，背後是連溫卿與新文協的介入，也因此外部力量，使得這項地方性勞工運動得以擴大連結全臺勞工團體和思想團體，成為全臺性社會運動網絡。

臺灣鐵工所罷工運動尾端，高雄臺灣機械工友會做了戰略上的調整，不僅由鐵工所罷工團 8 名工人委員成立行商團，更籌組勞工自主企業，這項基礎源自臺南機械工友會的黃賜和盧丙丁募款。後來，黃賜應邀擔任高雄臺灣機械工友會顧問，並進一步推動「工友鐵工所」籌建計畫，打算以社會運動期間所得捐款建立工人自己的事業體「株式會社明德工程局」，最後決定以株式會社方式，每位會員各持有一股（20 圓），場址設於三塊厝。換言之，除了外部組織的支持，高雄工友會也不斷試圖以某種資本營運的方式，擴大自我組織的能力。可惜的是，興建期間遭遇颱風而使得計畫中斷。

資金短缺、募款不易，深深影響勞工團體的運作。當 1927 年 7 月蔣渭水所領導的臺灣民眾黨成立之後，同年 10 月 24 日該黨高雄支部成立，初由黃賜擔任高雄支部負責人，黃賜隨即又當選該黨中央執行委員。也因為黃賜，高雄臺灣機械工友會更名為高雄機械工友會，會員來到 630 人。至此，高雄主要勞工團體可謂是臺灣民眾黨的地方組織，政治色彩更為鮮明。從有限的資訊窺探，黃賜積極透過募款籌建「高雄工友鐵工場」，試圖為高雄機械工友會建立工人的自治、自理，某種程度意味著勞工團體自我組織與發展的能力。不過，黃賜也善用外部組織的力量，特別是他所參與的臺灣民眾黨，1928 年 4 月到 5 月的淺野水泥高雄工場大罷工，就是以黃賜為首，在臺灣民眾黨的充分支持下的社會運動。也因為這項社會運動更具組織性，政黨涉入強烈，其所遭受的取締、檢舉更為嚴厲。

綜觀前述，政治大環境亦即大正民主應該才是臺灣社會運動的主要前提，有此政治條件才能讓日治以來臺灣人因教育和媒體所帶來的知識增長，因殖民地知識分子受到殖民母國近代化文化啟蒙與洗禮，以及 1920 年代臺灣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民族啟蒙和協力

等種種文化力量，得以實踐並不斷滾動、修正。而後，伴隨著臺灣島內政治團體的分裂與競爭，政團為了擴大影響力無不積極涉入勞工運動，高雄的兩大勞工運動事件剛好分別在當時最重要的左翼和右翼政團組織協助下，發揮了最大的影響力。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參考書目／

一、史料

(一) 官方文書

「雇郭盛依願免ノ件」(1926年7月1日)・〈大正十五年七月至九月人事書類專賣局〉・《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12448034。
臺灣總督府(1916年7月13日)・《府報》。

(二) 書籍

田中一二、芝中一(1918)・《臺灣の工業地 打狗港》。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杉浦和作(1929)・《高雄州商工人名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編纂部。
宮川次郎(1927)・《臺灣の農民運動》。臺北：拓殖通信社支社。
宮川次郎(1929)・《臺灣の社會運動》。臺北：臺灣實業界社營業所。
高雄市役所(1929)・《高雄市勢要覽(昭和三年版)》。出版地不詳・高雄市役所。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2005)・《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2007)・《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I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2009)・《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II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2011)・《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IV》。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三) 報紙

〈高雄鐵工罷工的情況〉(1927年4月9日)・《臺灣民報》・第155號。
《臺灣日日新報》(依時間序排列)
〈看報紙〉(1906年7月1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1版。
〈工場同盟罷業〉(1915年1月22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3版。
〈船員罷工騒ぎ 包金で納まる〉(1918年3月16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7版。
〈船員罷工解決〉(1918年3月17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6版。
〈船匠罷業同盟〉(1919年7月19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6版。
〈船大工罷業 雙方の譲歩にて解決〉(1919年7月20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7版。
〈打狗船夫直上要求 食料其他五割増〉(1919年8月17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7版。
〈打狗的罷工 洋服職工と船大工〉(1920年1月14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7版。
〈打狗罷業續報 硬軟二派を生ず〉(1920年1月16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2版。
〈高雄鐵工所同盟罷業 圓滿に解決す〉(1921年7月24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7版。
〈高雄鐵工所職工百八十名の罷業 位置の保障を要求して〉(1921年7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3版。
〈洋服工友會會況〉(1925年6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漢文第4版。
〈華僑工友罷工詳報 製鞋工友會員解雇四十餘名〉(1927年2月17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漢文第4版。
〈高雄工友會舉行發會式〉(1927年4月5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漢文第6版。
〈臺灣鐵工會社の同盟罷業は 持久戦に入る〉(1927年4月10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5版。
〈罷業する以上 解雇は覺悟の前 職工の身の振り方は 左まで困難ではない 工友會の幹部談る〉(1927年4月18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2版。
〈臺灣鐵工會社事件 解雇職工 交渉徴収之運動會費及解職手當金〉(1927年4月19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漢文第4版。
〈同情高雄之罷工 開講演會〉(1927年4月23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漢文第4版。
〈民衆黨高雄 支部發會式〉(1927年10月25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5版。
〈高雄工友會組織鐵工場 豫定不日興工〉(1927年12月12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漢文第4版。

〈工友總聯盟 中央執行委員會〉（1928 年 4 月 24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漢文第 4 版。

二、專書

- 王御風（2013），《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臺北：玉山社。
- 王御風（2018），《舊港新灣：打狗港濱戲獅甲》。高雄：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王御風（2019），《從淺野到臺泥——臺灣第一的水泥廠》。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2002），《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二版）。臺北：海峽學術。
-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
- 吳連實（1995），《高雄都會區工業發展的時空過程和環境變遷》。高雄：高雄復文。
- 吳濟華主持（2002），《高雄市的產業：從農工、重化到高科技》。高雄：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周婉窈（1989），《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晚報。
- 翁佳音譯註（1992），《臺灣社會運動史——勞工運動、右派運動》。臺北：稻鄉。
-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1988），《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
- 陳翠蓮（2008），《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臺北：遠流。
- 楊渡（2009），《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臺北：南方家園文化。
- 蔡石山（2012），《滄桑十年 簡吉與臺灣農民運動（1924-1934）》。臺北：遠流。
- 蔣朝根編著（2020），《臺灣民眾黨特刊 第一冊（復刻及附冊）》。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 蔣闊宇（2020），《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臺北：前衛。
- 簡炯仁（1991），《台灣民眾黨》。臺北：稻鄉。

三、期刊暨合輯文章

- 王御風（2022），〈高雄港、飛行場與工業區：從《鳳山地政》檔案看日治末期戲獅甲、草衙工業區的發展〉，《高雄文獻》，12（1），頁 6-28。
- 伊藤幹彥（2004），〈台灣社會主義思想之研究：連溫卿與謝雪紅〉，《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42（2），頁 43-74。
- 江亮演（1997），〈日據時代台灣農民與勞工的社會運動〉，《社會科學學報》，5，頁 1-14。
- 張明雄（1987），〈日據時期臺灣勞工運動之發展〉，《勞工研究》，89，頁 114-125。
- 許雪姬訪問、丘慧君紀錄（1995），〈黃獻瑞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記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 246-25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黃美娥（2009），〈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5，頁 1-39。
- 黃師樵（1977），〈日據時代臺灣工人運動史（1-4）〉，《夏潮》，2（5）至 3（2）。
- 賴莞頻（2012），〈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民報》共塑公共領域：以文化講演會為中心一九二三～一九二六〉，《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0（2），頁 59-108。

四、碩博士論文

- 陳淑端（2013），〈空間與地方文化燒製——高雄城市文化脈絡下的唐榮磚窯廠〉。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所碩士論文。
- 廖師慧（2004），〈日治時期水泥工業之發展——以淺野財閥為中心〉。高雄：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碩士論文。
- 蔣闊宇（2014），〈殖民地時期臺灣勞工抗爭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采芳（2007），〈1930 年代後期的高雄港與軍需工業〉。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五、研究報告

財團法人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執行（2000），《高雄市勞工史——概論》專題委託研究報告書。高雄：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六、檔案

〈高雄臺灣機械工友會員發命式紀念〉，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3.013.023。

〈高雄機械工友會員淺野水泥工場要求就業規則發表代表委員成功紀念〉，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3.013.019。

〈高雄機械工友會員會議〉，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3.013.027。

〈臺灣民眾黨高雄支部結黨式紀念〉，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03.013.029。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